

写作知识

XIEZUOZHISHI

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组

1978年9月

写作知识

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组编

一九七八年八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 一 章 文风	(7)
第 二 章 主题和题材	(27)
第 三 章 结构	(43)
第 四 章 表达方法	(60)
第 五 章 革命大批判文章	(100)
第 六 章 文艺评论	(115)
第 七 章 杂文	(134)
第 八 章 通讯	(149)
第 九 章 调查报告和经验总结	(171)
第 十 章 三史	(183)
第十一章 散文	(192)
第十二章 诗歌	(205)
第十三章 短篇小说	(217)
第十四章 曲艺	(231)
第十五章 文章的修改	(249)

绪 论

为谁而写作？这是我们在提笔之前首先要明确的问题，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的教导，为我们写作指明了方向。为工农兵而写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造革命舆论，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文章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写文章就是造舆论。在阶级社会里，一切舆论工作，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并且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这一光辉论述精辟地阐明了舆论工作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深刻地总结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特别重大意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大造革命舆论，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样必须大造革命舆论。而资产阶级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大造反革命舆论。因此，在这条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就是十分尖锐激烈的。

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毛主席尖锐地指

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这段话，深刻地指出了一切反动派的共同本性就是要杀害人民。所不同的是，有的用枪杆子杀人，有的用笔杆子杀人。而用笔杆子杀人，它能起到枪杆子起不到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四人帮”就是一伙用笔杀人的杀人惯犯。他们集中外历史上一切反动派用笔杀人的反革命经验之大成，在用笔杀人这一方面，比起梁漱溟、林彪、“四人帮”之流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们除了自己用笔杀人之外，还直接操纵“梁效”、“罗思鼎”等一支支反革命别动队，控制宣传舆论大权，炮制一篇篇黑文，抛出一本本黑书，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把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十分重视大造革命舆论。列宁指出：“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毛主席说：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解放以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领导我党和我国人民，进行了反对林彪和王张江姚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写下了许多光辉不朽的文献，用无产阶级革命舆论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舆论，

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关于“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的教导，从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大造革命舆论，使我们写出来的文章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写作》是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贯重视写作学习。早在一九三六年，毛主席在给延安抗大的一封信中曾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部分。……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制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精，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一九四二年在《文化课本序》中又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毛主席所说的看书作文，在中文系就是阅读写作，这是最基础的课程。写作课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写出为工农兵欢迎的文章，更好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歌颂三大革命斗争中涌现的新人新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大造革命舆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要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就

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改造世界观，洗刷唯心精神，坚持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导写作活动。只有投身火热的三大革命斗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把立足点逐渐地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才能了解熟悉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才能使写出来的文章服务于三大革命斗争，为工农兵所欢迎。林彪和“四人帮”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一贯反对革命实践，反对青年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大肆宣扬“天才”论。“四人帮”打着“文艺作品不要写真人真事”的幌子，反对文艺创作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反对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导创作。这就必然会导致关在玻璃窗内臆造作品，或靠书本讨生活，靠“改编”别人的作品混日子。其罪恶用心，就是妄图把青年一代引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歧途，成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书呆子，变成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鲁迅先生说得好：“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是对林彪、“四人帮”之流鼓吹“天才”论的绝妙讽刺。毛主席在《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两文中，深刻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们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我们一定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

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实践，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在向工农兵学习的过程中，认真改造世界观，吸取丰富的写作源泉，在革命实践中写出为工农兵欢迎的文章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学习写作同其它工作一样，首先要求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同时也要求我们努力钻研业务，掌握一定的写作知识和写作技巧。没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不掌握一定的写作技巧，也是不会写出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章来的。片面地否定业务，否定写作方法的锻炼，思想观点再深刻，也不能表达出来，仍然起不到宣传教育作用。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力求使我们写出来的文章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长期以来，“四人帮”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散布了许多谬论，别有用心地提出：“知识到手，人被夺走。”把为革命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智育第一”。在他们的心目中，知识越多越不革命，而“交白卷”的“大学生”却变成了最革命的“英雄”。其罪恶目的就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实现篡权复辟的迷梦。我们一定要划清“为革命刻苦学习业务”与“业务挂帅”的界限。在政治统帅下，努力学习业务，提高写作水平，正是无产阶级高度政治责任感的表现。当然，也要防止走到单纯追求技巧的邪路上去。

有的同学认为自己的文化基础差，觉得“提笔千斤重”。

对写作有畏难情绪。这是中了“天才论”的毒。许多事实证明，写作是能够学好的。有些同学，刚进校时文化基础并不高，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写作实践，提高很快。当然，对于基础差一些的同学，更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有的同学总以为写作有什么“诀窍”，一旦掌握了这个“诀窍”，文章就能写好，其实这是误解。写作当然有它的规律，这是要学习的，但关键还在于自己的实践，也就是要多写。这样，才会接触到写作当中的许多具体矛盾；从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多读，把读和写结合起来。毛主席的文章内容博大精深，表达上具有高度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是我们学习写作的典范。鲁迅先生的文章思想深远，文笔锐利，同样要好好学习。报刊杂志上的好文章，跟形势紧，直接反映现实斗争，也要注意学习。鲁迅先生说过：“凡是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就全部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多读好文章，眼界就高了，可以参考、借鉴的东西就多了。一个劲地闷着头写，不注意阅读，不注意从别人文章中吸取好的东西，也容易流于盲目实践，不能有较快的提高。

第一章 文 风

第一节 什么叫文风

文风，就是在文章和讲话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作风。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思想作风，就必然有什么样的文风。文风问题，决不单纯是一个语言表达和文字技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学风和党风问题。它是同一定的阶级和路线紧密联系着的，是为一定的阶级和路线服务的。

一、文风的阶级性

文章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文风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路线有截然不同的文风。

在我国封建社会，曾经盛行过科举制度，即考试制度，规定了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是文章的正文，规定每一段都要有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因为内容空泛，现在多用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毛主席经常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讽刺教条主义。

封建统治阶级之所以要硬性规定这种刻板的、僵死的、形式主义的八股文，就是为了禁锢知识分子的头脑，好让知识分子乖乖地跪倒在他们的脚下，为他们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八股文实际上成了封

建地主阶级实行反动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文风。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它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旧观念的同时，对这种老八股、老教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那时，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出现了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新鲜活泼的革命内容的新文风，为中国人民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服务。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就是“五四”时期新文风的杰出代表。由于“五四”运动中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各种思潮都有，运动发展到后来，分成了两个潮流。以毛主席为杰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革命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在我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风。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用形式主义的方法看问题，对于历史、现状和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连中国的宝贵遗产也不要了；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连外国的月亮都是好的。这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在文风问题上就表现出洋八股、洋教条。这是资产阶级的文风，胡适就是这种文风的代表。

洋八股、洋教条反映在党内就叫做党八股。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这也是资产阶级文风。当时混进党内的王明之流，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他们在党内把洋八股、洋教条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用以为他们“左”右倾机会主

义路线服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王明之流刮起的这股党八股的歪风，曾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林彪一伙，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地继承了党八股这种资产阶级文风，把它发展到了极端腐朽、庸俗的地步。这种文风的特征是讲假话、讲空话、讲绝话、搞诡辩、耍花腔。这是由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特征所决定的。为了掩盖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只好装腔作势，哗众取宠，大搞文字游戏，堆砌形容词、副词之类。什么“顶峰”，“大树、特树”，“政治中的政治”，还有什么“最、最”。这是骗子文风，修正主义文风。

由此看来，文风是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联系着的，只要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存在，也就有不同阶级文风的斗争。

二、革命导师十分重视文风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就十分重视文风问题，重视无产阶级文风的建立，而且重视对反动腐朽文风的批判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主席，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为革命进行写作，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字，表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内容，有力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进，给我们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的光辉典范。同时，革命领袖又总是把文风问题和革命斗争及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在和阶级敌人以及对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对于剥削阶级的腐朽文风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斗争。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六月十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今天收到两份手稿。一份非常出色，就是你的关于筑城的文章……另外一份荒唐可笑，即拉萨尔向我和你所作的关于他的《济金根》的答辩。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一大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三二页）马克思高度赞扬了恩格斯“非

常出色”的文章，严厉批评了拉萨尔的“荒唐可笑”的又臭又长的答辩。恩格斯曾在一八八五年十月写的《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六七页。）热情称赞马克思“最简洁最有力”的文风。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写的《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八三、二八一页）。列宁教育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要说真话，反对说假话。斯大林于一九〇一年九月写的《编辑部的话》一文中指出：“格鲁吉亚报纸应当把格鲁吉亚的战斗工人跟俄罗斯的战斗工人联系起来，团结起来。它应当向读者报道本地生活、俄国生活和国外生活中一切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事物。”（《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斯大林指示报纸要反映国内外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生活。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同样十分重视文风问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至五卷的一系列著作中，毛主席都深刻地论述了文风问题，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重视。在跟错误路线的长期斗争中，毛主席不断号召全党同腐朽文风作坚决的斗争。早在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就在《矛盾论》中批判了教条主义者和他们的八股调，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一九三八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为了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肃清其腐朽文风的流毒，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号召全党起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指出：“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又针对刘少奇推行的“左”倾路线和宣传工作中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脱离中央路线的过左错误，发表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文章，批判错误路线及其不正文风。指出：“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一九五五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毛主席针对当时文章中存在的晦涩难懂和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推理缺乏逻辑性，不讲究词章等八股气，又写了一系列按语和《工作方法（草案）》。指出：“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的。”再次批判了党八股，进一步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树立无产阶级文风的要求，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服务。一九七二年，为了全面清算林彪的反党罪行，肃清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又进行了一次关于文风问题的大革命。毛主席亲自批转了商业部的两篇好而短的调查报告，要《人民日报》发表，指出：文章太长，谁看？必须要改一下。各报刊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和大批判文章，有力地批判了林彪一类骗子腐朽的资产阶级文风。

第二节 打倒帮八股

“四人帮”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创造了一种反动的文风——帮八股。文如其帮。这种帮八股，是“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以及行帮主义的组织路线的必然产物。它不但继承了封建地主阶级老八股和资产阶级洋八股的衣钵，而且拣来了王明机会主义的党八股以及林彪一类骗子文风的破烂，熔封、资、修黑货于一炉，从而变成了最典型、最腐朽、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文风。这种文风带有“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的一切特征。长期以来，“四人帮”把帮八股作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表现形式，为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服务。

帮八股有哪些表现呢？

一、专横武断，乱扣帽子。“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从来不对客观事物作调查研究，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他们写文章、作报告，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动不动就板起面孔，打棍子，扣帽子。如：湘剧《园丁之歌》（《人民文学》一九七六年第八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剧目，在华国锋同志亲切关怀和亲自推荐下，一九七三年摄制成彩色影片。但“四人帮”强令北京、天津、上海和湖南进行批判，逼迫湖南省委按照他们划定的框框写文章表态，并且指使文化部的御用写作班子“初澜”，炮制了《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黑文，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对《园丁之歌》进行恶毒攻击。说什么《园丁之歌》“露骨地

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至上’论，贩卖‘智育第一’这一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否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给《园丁之歌》戴上“文化至上”、“智育第一”、“修正主义教育”、“否定党的领导”四顶大帽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叛徒江青还胡说什么：“园丁应是共产党员，怎么讲成教师、知识分子呢？”，“‘没文化怎么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这句话问题就更大，简直是反攻倒算。”乱打棍子。他们诬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同志是“没有路线觉悟”、“没有头脑的螺丝钉”；他们攻击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矛头向下”，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他们谩骂抓生产、抓智育是“搞唯生产力论”、“搞智育第一”等等，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他们大搞绝对化，文章中充塞了不少“就是”什么，“宁要”什么等武断专横的词句。什么“整顿就是复辟”，“不管东震西震，不能冲淡革命”，“宁要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等等，内容反动，形而上学。

二、造谣撒谎，歪曲事实。“四人帮”坏事做绝，人心丧尽，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于是只好靠造谣言、说假话过日子。在他们把持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中，塞满了假典型、假报道。“白卷先生”张铁生的报道，就是突出一例。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听了关于张铁生“答卷”的汇报，如获至宝，在他的指示下，《辽宁日报》于七月十九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加了编者按。八月二日《文汇报》转载，八月十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张铁生在入学考查时，四门功课总共得了105分，明明是个“劣卷”，而在报道中硬说成是“白卷”；张铁生在信上明明写了一连串打击别人，吹嘘自己的见不得人的肮脏话，甚至写上了“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

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这样利欲熏心的话，而在公布原信时，他们却心怀鬼胎，一笔抹去了。并在按语中吹得天花乱坠，什么“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颇有见解”呀，“发人深省”呀，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涂上一层“反潮流”的油彩，把他当作一块石头，到处打人。反党野心家、无耻叛徒江青为了要当“女皇”，到处叫嚷：“刘邦死后，他的妻子吕后专政”，说吕后“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授意炮制了一系列吹捧吕后的黑文，随心所欲地篡改历史，欺骗群众。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伪造毛主席的所谓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并且密令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报道时要突出这句话，“不要怕重复”，“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一句话，就是造假。说假话，造假事，搞假典型，编假历史，拍假照片，甚至伪造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话。

三、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四人帮”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干的事是见不得人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得借用亡灵，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施放暗箭。他们把持的报刊充斥着议宰相、批大儒、论辩帅、评洋务派之类的文章，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由江青亲自点题、审阅、批转，由“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炮制的《孔丘其人》这株大毒草，就是射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一支毒箭。黑文名为介绍孔丘，实则是恶毒攻击周总理。全文分三段，第一段写孔老二的出身，第二段写孔老二一得势就杀少正卯，第三段写孔老二到处碰壁。黑文一开头就急忙交代写作意图，说什么批判孔丘“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所谓“一类”，就是指的周总理。关于这点，“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有过自供。当有人问他孔丘指的是谁？他曾颇为得意地说，“你看着象谁就是谁。”“梁